

儒家文化与财务重述：基于沪深A股的经验证据^{*}

○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董晓琳 冯银波

摘要：在传统文化复兴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双重时代背景下，探究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机制。选取2014—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边界。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影响力与企业财务重述概率呈显著负相关，该结果经替换被解释变量、自变量滞后一期、剔除直辖市样本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正式制度与儒家文化在约束财务重述行为中存在替代效应，市场化程度越低，儒家文化的治理作用越强；外来文化冲击会显著弱化儒家文化的治理效应，在董事（监事、高管）无海外经历的企业中，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研究证实儒家文化可有效弥补正式制度约束的缺陷，在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发挥积极治理功能。

关键词：儒家文化；财务重述；正式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5

一、引言

财务重述是指企业对前期财务报表中存在的会计差错进行追溯更正的行为，其发生说明企业财务信息存在重大缺陷、信息披露质量较差，在更深层次反映出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和外部监督体系的双重失效。频繁的财务重述，不仅会降低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误导投资者决策，还会加剧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与市场信任基础。现有文献围绕财务重述的诱因与治理机制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多聚焦于内部控制、公司治理、外部审计及制度监管等正式制度层面，对文化传统、商业伦理等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关注相对不足。

以2014—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影响，重点探讨3个核心问题：其一，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是否有显著抑制作用？其二，正式制度环境如何调节儒家文化与财务重述的关系？其三，外来文化冲击对儒家文化的治理效果产生何种影响？本研究旨在拓展非正式制度与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边界，为构建兼具制度约束与文化引导的资本市场治理体系提供经验与证据。

二、研究假说

（一）儒家文化与财务重述

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企业的决策逻辑与行为模式。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内部文化特征，忽视了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宏观制度情境所承载的文化体系，因而难以充分解释“重义轻利”等本土企业行为的独特生成逻辑。儒家伦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价值理念，经千年积淀，已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企业实践。已有研究显示，儒家文化在公司治理层面展现出多维积极效应：儒家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而且与法律环境形成互补、与行业竞争构成替代关系^[1]；儒家文化能够优化企业风险管理能力^[2]，抑制非理性投资行为^[3]；还能够提升企业出口产品的质量^[4]。在代理问题层面，儒家文化能有效抑制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5]、降低企业违规概率^[6]、强化战略稳健性^[7]。

财务重述是评价信息披露质量的核心指标，其发生说明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受到了损害^[8]。尽管已有研究从管理者特质^[9]、薪酬激励等视角探讨了财务重述的诱发因素，但尚未系统揭示儒家

^{*} 基金项目：2022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互联网普惠金融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研究”（2022-ZZJH-035）；河南工业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项目“科教融汇”（KYXL2025133）。

第一作者简介：董晓琳（2005—），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本科生。

通信作者：冯银波，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财务与治理。

文化这一深层基因对财务重述的作用机理。

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1: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即儒家文化与企业财务重述呈负相关。

(二)正式制度环境对儒家文化的替代效应

文化是塑造个体认知与行为模式的重要因素,但文化影响力的实现程度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与制度环境、技术条件等互补融合并共同发挥作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长期历史演进中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在正式制度缺失、模糊或执行成本极高等特定场景中,二者会表现出替代关系^[10]。中国区域制度发展具有显著异质性,使儒家文化的治理效能随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而动态调整,在制度欠发达地区,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更强;制度相对成熟的地区,该作用趋于弱化^[11]。具体而言,正式制度通过重塑企业决策逻辑与弱化非正式约束两条路径,对儒家文化产生替代效应。一方面,正式制度所强化的股东价值最大化导向重塑了企业的决策逻辑,使管理者聚焦于短期经济目标,减少对社会等非经济维度的关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内核。另一方面,正式制度能够从3个层面弱化儒家文化的治理效能:①契约完备性的提升降低了经理人对非正式规则的依赖,形成制度性替代;②薪酬激励的短期时间贴现效应强化了管理者的短视倾向,削弱了儒家“长期主义”的治理哲学;③法律惩戒机制的外部约束替代了“忠”“信”等道德自律,挤占了非正式制度的边际治理空间。因此,正式制度环境对儒家文化的治理作用存在替代效应。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正式制度环境会削弱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即市场化程度越高,儒家文化的治理效应越弱。

(三)外来文化对儒家文化影响财务重述的冲击效应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跨文化交流推动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共存的格局。国际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引入,将契约治理模式嵌入企业管理实践,在提升治理规范性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儒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解构效应。一方面,职业经理人更倾向依据正式制度和专业流程进行决策,而非沿袭儒家“上行下效”的文化传统,从而削弱了文化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当正式制度存在约束盲区时,对制度规范的过度依赖可能诱发“合规范范围内的自律”与“制度边界外的自利”并存的决策异化现象^[12]。

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核心部分,其治理效果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外来文化冲击作为重要的环境变量,通过两条路径弱化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一是直接路径,即外来文化所承载的契约理念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对儒家集体主义与道德自律形成替代性冲击;二是间接路径,外来文化加速了正式制度的完善进程,提升了制度规范的精细化水平,从而间接弱化了儒家文化的影响力。因此,在外来文化影响较为深远的地区,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对企业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会减弱。

本研究提出假设 H3:外来文化冲击会弱化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抑制效果,即董事(监事、高管)海外经历比例越高,儒家文化的治理效应越弱。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2014—2023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①剔除ST和*ST类上市公司;②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③剔除财务数据与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31228个公司的年度观测值。儒家文化相关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全国孔庙分布信息获得,财务重述数据、公司财务数据与治理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为了消除极端数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水平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财务重述(R_s)。采用虚拟变量度量,若企业在以后年度因会计差错对当期财务报表进行追溯更正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2. 解释变量:儒家文化(C_i)。借鉴孔庙分布法进行度量,即对上市公司注册地方圆100、200、300 km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 C_{i100} 、 C_{i200} 、 C_{i300} ,数值越大说明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越强。

3. 调节变量:①正式制度环境(M_i)。采用王小鲁等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市场化总指数衡量,该指数越高表示地区正式制度环境越完善。

②外来文化冲击(O_s)。采用企业董事(监事、高管)是否具有海外教育或工作经历的虚拟变量衡量,若至少有1名董事(监事、高管)具有海外经历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4. 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选取公司规模

(S_z)、董事会规模(B_d)、公司产权性质(S_o)、两职兼任情况(D_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_{p1})、资产负债率(L_v)、两权分离度(S_p)以及独立董事所占比例(I_p)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行业固定效应(I_n)和年度固定效应(Y)。

(三)模型构建

参考张春强等^[13]的研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影响:

$$R_{s(i,t)} = \beta_0 + \beta_1 C_{f(i,t)} + \beta_2 C_i + I_n + Y + \varepsilon_{(i,t)}$$

式中: $R_{s(i,t)}$ 为*i*企业与观测年度(*t*)的财务重述; C_i 为控制变量(包括财务指标、公司治理指标等); C_f 为儒家文化效应; I_n 为行业固定效应; Y 为年度固定效应; β_0 为截距项; β_1 是儒家文化效应的回归系数,反映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边际影响; β_2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向量,反映各个控制变量对财务重述的边际效应;*i*和*t*分别为企业与观测年度;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若假设 H1 成立,儒家文化变量(C_f)的回归系数应显著为负,表明儒家文化影响力越强,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越低。

为检验调节效应,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儒家文化与正式制度环境、儒家文化与外来文化冲击的交互项,或进行分组回归。

四、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 1 可知,财务重述的均值为 0.091,说明样本中约 9.1%的公司发生过财务重述行为,与现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解释变量 C_{f100} 、 C_{f200} 、 C_{f300} 的均值分别为 1.82、2.690、3.255,中位数分别为 1.946、2.773、3.401,表明随着企业注册地辐射半径增大,其周边覆盖的孔庙数量相应增加,儒家文化影响力呈上升趋势。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统计量	财务重述	C_{f100}	C_{f200}	C_{f300}
样本量	31 228	31 228	31 228	31 228
平均值	0.091	1.824	2.69	3.254
标准差	0.288	0.704	0.761	0.764
最小值	0	0	0	0
中位数	0	1.946	2.773	3.401
最大值	1.000	2.944	3.989	4.543

注: C_{f100} 、 C_{f200} 、 C_{f300} ,分别为 100、200、300 km 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二)基准回归分析

由表 2 可知,模型(1)至模型(3)分别以 C_{f100} 、 C_{f200} 、 C_{f300} 作为解释变量,在控制公司特

征与治理变量、行业固定效应和年度固定效应后,3 个儒家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值分别为-0.007、-0.009、-0.008。表明随着儒家文化影响力提升,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下降,即儒家文化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财务重述,假设 H1 被证实。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回归系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C_{f100}	-0.007*** (0.002)		
C_{f200}		-0.009*** (0.002)	
C_{f300}			-0.008*** (0.002)
常数项	0.303*** (0.042)	0.315*** (0.043)	0.314*** (0.04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228	31 228	31 228
调整后 R^2 (决定系数)	0.060	0.061	0.060

注:***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C_{f100} 、 C_{f200} 、 C_{f300} ,分别为 100、200、300 km 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采用企业当年是否发生年报、中报或季报会计差错更正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换指标(财务重述),重新验证两者间的关系(见表 3)。由表 3 可知,3 个儒家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值分别为-0.005、-0.008、-0.008。表明企业当年是否发生年报、中报或季报会计差错更正,随着儒家文化影响力提升,企业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下降,即儒家文化可以有效地抑制企业财务重述,假设 H1 被证实。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1)	(2)	(3)
	年度财务重述	中期财务重述	季度财务重述
C_{f100}	-0.005** (0.002)		
C_{f200}		-0.008*** (0.002)	
C_{f300}			-0.008*** (0.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续表 3

变量	(1)	(2)	(3)
	年度财务重述	中期财务重述	季度财务重述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31 228	31 228	31 228
调整后 R^2 (决定系数)	0.070	0.075	0.076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C_{f100} 、 C_{f200} 、 C_{f300} ，分别为 100、200、300 km 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2. 自变量滞后一期

考虑到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同时缓解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滞后一期的儒家文化变量($L. C_{f100}$ 、 $L. C_{f200}$ 、 $L. C_{f300}$)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3 个滞后变量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自变量滞后一期)

变量	财务重述		
	(1)	(2)	(3)
$L. C_{f100}$	-0.006 ** (0.003)		
$L. C_{f200}$		-0.008 *** (0.003)	
$L. C_{f300}$			-0.008 *** (0.003)
常数项	0.288 *** (0.046)	0.298 *** (0.047)	0.298 *** (0.04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25 522	25 522	25 522
调整后 R^2 (决定系数)	0.067	0.067	0.067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L. C_{f100}$ 、 $L. C_{f200}$ 、 $L. C_{f300}$ ，分别为儒家文化效应滞后一期观测值(100、200、300 km 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3. 剔除特殊样本

考虑到直辖市上市公司在制度环境与治理特征上的特殊性，剔除注册地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的样本后重新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儒家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不受特殊样本的影响。

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剔除特殊样本)

变量	模型回归系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C_{f100}	-0.006 ** (0.003)		
C_{f200}		-0.009 *** (0.002)	

续表 5

变量	模型回归系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C_{f300}			-0.009 *** (0.002)
常数项	0.249 *** (0.049)	0.260 *** (0.049)	0.260 *** (0.04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	25125	25125	25125
调整后 R^2 (决定系数)	0.064	0.064	0.064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C_{f100} 、 C_{f200} 、 C_{f300} ，分别为 100、200、300 km 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四)调节效应检验

1. 正式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由表 6 可知，在低市场化组中儒家文化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明显高于高市场化组，表明在低市场化指数下，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代表，其治理效应呈现边际递增特征，能够加强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表现为企业所处地区制度规范成熟度越低，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越显著，形成对正式制度环境的替代性治理补偿，验证了假设 H2。

表 6 正式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的回归系数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高市场化	低市场化
C_{f100}	-0.011 (0.007)	-0.009 ** (0.004)				
C_{f200}			-0.014 (0.009)	-0.010 *** (0.004)		
C_{f300}					-0.006 (0.014)	-0.010 *** (0.003)
常数项	0.488 *** (0.085)	0.332 *** (0.078)	0.508 *** (0.088)	0.343 *** (0.078)	0.484 *** (0.097)	0.344 *** (0.07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0 446	12 304	10 446	12 304	10 446	12 304
调整后 R^2 (决定系数)	0.031	0.043	0.031	0.044	0.031	0.044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C_{f100} 、 C_{f200} 、 C_{f300} ，分别为 100、200、300 km 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2. 外来文化冲击的调节效应

企业战略决策层在公司治理体系中承担关键职责，其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程度会显著影响企业

财务重述发生概率。具有海外教育或工作背景的董事(监事、高管)因更易接受外来文化冲击,在决策过程中可能更倾向于遵循国际规则与制度规范,从而削弱中华传统文化对其价值取向的引导作用,诱发管理者的短视主义倾向,最终降低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抑制效应。为验证这一推论,选取是否有海外教育或工作经历的董事(监事、高管)进行分组回归。

由表 7 可知,在无海外经历组中,儒家文化与财务重述显著负相关;有海外经历组中,儒家文化的抑制作用相对不显著。表明董事(监事、高管)受外来文化影响程度越高,儒家文化对企业财务重述的抑制作用越弱。

表 7 外来文化冲击的调节效应

变量	模型的回归系数					
	(1)有海外经历	(2)无海外经历	(3)有海外经历	(4)无海外经历	(5)有海外经历	(6)无海外经历
$C_{f_{100}}$	-0.004 (0.003)	-0.012*** (0.004)				
$C_{f_{200}}$			-0.008** (0.003)	-0.011*** (0.003)		
$C_{f_{300}}$					-0.008*** (0.003)	-0.008*** (0.003)
常数项	0.323*** (0.055)	0.268*** (0.070)	0.338*** (0.056)	0.276*** (0.070)	0.340*** (0.056)	0.272*** (0.07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	18 129	13 099	18 129	13 099	18 129	13 099
调整后 R^2 (决定系数)	0.061	0.061	0.061	0.061	0.061	0.061

注:***、**,分别表示在 1%、5%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C_{f_{100}}$ 、 $C_{f_{200}}$ 、 $C_{f_{300}}$,分别为 100、200、300 km 范围内的孔庙数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五、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基于 2014—2023 年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系统考察了儒家文化对财务重述的影响及作用边界。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财务重述行为,降低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概率;正式制度环境与儒家文化存在替代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儒家文化的治理效能越弱;外来文化冲击同样会削弱其约束效力,即在外来文化影响较弱的地区,儒家文化的治理效应更为突出。因此,作为非正式制度核心构成的儒家文化,能够有效弥补正式制度约束的缺陷,在改善企业信息环境、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方面发

挥积极的治理功能。

本研究为理解非正式制度在企业治理中的功能边界提供了经验证据,对现代企业管理与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具有启示:第一,企业应充分重视儒家文化的治理价值,辩证汲取“仁爱”“诚信”“自律”等核心伦理思想,将其深度融入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高管行为规范,从文化根源上抑制机会主义动机,减少财务重述等违规行为的发生。第二,政策制定者需深刻认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互补与替代关系,在持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制度建设的同时,应注重激活本土文化资源的治理潜能,构建制度约束与文化引导双轮驱动的资本市场协同治理体系。第三,在经济全球化与跨文化交流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企业应审慎应对外来文化对本土伦理秩序的冲击,在吸收国际先进治理经验的同时,坚守传统文化中关乎诚信与长期主义的价值内核,探索构建兼具文化自信与现代治理特征的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邹萍,李谷成. 儒家文化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吗[J]. 经济评论,2022,43(2): 154-170.

[2]金智,徐慧,马永强. 儒家文化与公司风险承担[J]. 世界经济,2017,40(11): 170-192.

[3]叶彦. 儒家文化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J]. 财经问题研究,2018,40(2): 115-123.

[4]齐欣,王强. 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19,39(11): 87-97.

[5]古志辉. 儒家传统与公司绩效[J]. 制度经济研究,2015(1): 69-113.

[6]程博,熊婷,林敏华. 儒家传统文化与公司违规行为:基于中国家族上市公司的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8,38(10): 72-86.

[7]李文佳,朱玉杰. 儒家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J]. 经济管理,2021,43(9): 137-153.

[8]Bardos K S. Quality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liquidity[J].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11,20(2): 49-62.

[9]张川,罗文波,樊宏涛. CFO 背景特征对企业财务重述的影响:审计质量的调节效应[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0,17(4): 1-10.

[10]Helmke G, Levitsky S.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A research agenda[J].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04,2(4): 725-740.

[11]陈冬华,胡晓莉,梁上坤,等. 宗教传统与公司治理[J]. 经济研究,2013,48(9): 71-84.

[12]涂未宇,徐细雄,刘曼. 儒家传统与员工雇佣保障:文化的力量[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2(1): 66-84.

[13]张春强,胡博涵,叶皖强. 基于儒家文化的企业财务重述行为研究[J]. 蚌埠学院学报,2025,14(6): 62-72.